



上海财经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产经智库

工作简报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nk Tank Bulletin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总第9期
2016-02

目录

一、研究院媒体报道

我院院长于春晖就“众筹放映能否解小众影片市场之困”接受文汇报采访·····	1
我院副院长刘志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开明的自利”看影响力投资》·····	2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在《上海观察》上发表《去过剩产能，光按删除键还不行》·····	3
我院理事刘志彪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展服务业不等于产业空心化》·····	4
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抓住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	5

二、研究院论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6
《服务业开放与我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研究——基于特定服务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7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7
《电子商务、资源获取与中国民营企业绩效》·····	8

三、研究院出版物

研究院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产经文库》系列丛书·····	9
产经文库系列《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结构、制度与战略》·····	9
产经文库系列《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12
产经文库系列《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14

四、研究院活动及新闻

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在“G20 中国峰会：全球治理的比较视角”发表主题演讲·····	16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出席“中国经济下行对上海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16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出席“2016 年中国经济形势研判会”·····	17
我院联络人参加“第十期智库工作坊”并作交流发言·····	18
研究院协办“2016 年亚洲经济展望”专题报告·····	19

Contents

I Updated News

Wenhui Daily had an interview with Dean Chunhui Gan and published “Can movies which prepared by small amounts of investment from ordinary people be the solution of film market difficulties”.....	1
Vice Dean Zhiyang Liu published “The investment influence in terms of ‘donations from the philanthropists’” on Liberation Daily.....	2
Assistant Dianfan Yu published “Only removal is not enough to solve the severe overcapacity” on Shanghai Observation.....	3
Director Zhibiao Liu published “To develop the service industry doesn’t mean to hollow out the whole industry” on Renmin Daily.....	4
Honorary President Xinli Zheng published “It’s the time of seizing the key of changing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on Renmin Daily.....	5

II Updated Papers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New Normal”.....	6
“Research on the opening an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nalysis of specific service industry”.....	7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enterprise investment”.....	7
“Electronic commerce,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8	

III Updated Publications

Institute jointly published the “Chanjing Library” series with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9
<The study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structure, system and strategy>.....	9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negative list of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	12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s industry>.....	14

IV Updated Research Activities

Honorary President Xinli Zheng attended “Discover the Global Governance from a comparative angle”.....	16
Assistant Dianfan Yu attended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f Shanghai”.....	16
Assistant Dianfan Yu attended “the 2016 Economic Situation Judgment Forum”.....	17
Experts attended “the tenth think tank workshop” held by the management center.....	18
Institute co-organized “the 2016 Economic expectation of Asian”.....	19

我院院长干春晖就“众筹放映能否解小众影片市场之困”接受文汇报采访

2016年7月31日，我院院长干春晖接受文汇报采访，就众筹放映能否解小众影片市场之困发表观点和看法。采访报道如下（删节版）：

一部不被院线接纳的小众纪录电影，创造了“众筹放映”这一全新模式，这部影片叫做《我的诗篇》，是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得主。众筹放映，操作方式类似于预售，针对已获得放映许可但却难以登上商业院线的小众电影。“众筹放映”虽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已经成为业内的热门话题。人们最关心的是，“众筹放映”能否最终破解小众影片的市场之困？

干春晖院长认为，“众筹放映”通过信息平台，以较低成本来聚拢兴趣一致的观众，进行精准营销，真正实现了统计学上的长尾效应，可以为很多小众产品所效仿。这种方式之所以可行，在于充分利用了影院闲置的放映时间和空间，且降低了影院预先排片的风险。不过，众筹放映要想真正可持续，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观众人数是关键。“大市场里的小公司和小产品能不能活下来，不取决于众筹，而是取决于市场本身的大小。”干春晖院长这样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众筹放映还不能在现有商业模式之外，成为小众影片的成熟放映模式。

干春晖院长还指出，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小众产品应该是有前途的，因为分母够大，再独特的风格都有商业成功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也将反过来为这些产品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最终实现百花齐放。

我院副院长刘志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开明的自利”看影响力投资》

2016年2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我院副院长刘志阳撰写的题为《从“开明的自利”看影响力投资》的文章。文章围绕“影响力投资”这一新兴产业的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文章内容如下(删节版):

“影响力投资”是公益慈善事业的一项重大创新,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它将投资利益与公益目的有机结合,在投资获利的同时,可以为社会和环境带来积极效应。影响力投资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社会上有的人愿意无偿捐赠,有的则希望至少可以回本,有的甚至希望可以多少还能有一些回报,哪怕是比市场水平更低的回报。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出现顺应新兴慈善家既追求善款的使用效率又追求经济回报的趋势,是捐赠者“开明的自利”的一种体现。社会影响力投资从传统的慈善捐赠转向慈善投资,慈善家的捐赠变成一种投资,不再是简单的馈赠,更加注重实际的社会影响,并要求经济回报,其建立的是投资者和被投资者的一种经济契约关系。社会影响力投资与社会责任投资不同,社会责任投资的目标是避免对社会或环境造成伤害。而影响力投资关注投资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和治理的正向效应,同时追求投资财务收益。它促进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提升和良性互动。

根据摩根大通和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发布的《2015年度影响力投资报告》,影响力投资领域最迫切的问题(和两年前的同类研究结果一样)是生态的不完善。在中国,距离影响力投资生态的完善更是漫漫长路。因此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成熟经验和运行机制来培育我国社会影响力市场。

目前,我国还缺少一套可行的社会影响力的报告体系,使得影响力投资较难

发展起来。我们应结合国外正在发展的行业标准与本国实践，本土化影响力衡量体系，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能够衡量社会企业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的工具。影响力投资机构要明确对回报率的要求，创建对影响力的评估方法。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在《上海观察》上发表《去过剩产能，光按删除键还不行》

2016年3月7日，《上海观察》发表了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撰写的题为《去过剩产能，光按删除键还不行》的文章。文章围绕当前被广泛热议的“去过剩产能”这一重要话题展开分析与讨论。文章内容如下（删节版）：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要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新常态下，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增长动力将向结构升级、创新和服务经济驱动为主转换。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握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因素，以此来调整我们的战略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生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叠加的“新常态”。新常态注重的是中远期的趋势性变化。长期来看，我们以前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高成本时代需要新的动力来驱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一方面我国高端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像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样具有“价廉物美”的显著优势，因此难以短时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发达经济体已经感到了竞争

压力，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会更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削弱。因此，产业竞争力断档的风险在增大，如果不能在新的领域实现突破与跃升，我国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都会陷入较长时期的降速换挡的阵痛期。

目前，我国有诸多产业发展的战略出台，譬如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这些战略实质上在于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由于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打破产业融合壁垒的必由之路。

我院理事刘志彪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展服务业不等于产业空心化》

201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院理事刘志彪撰写的题为《发展服务业不等于产业空心化》的文章。文章围绕当前被广泛热议的“发展服务业”这一重要话题展开分析与讨论。文章内容如下（删节版）：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过度侧重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展，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业脱离制造业发展的基础，离开服务实体经济和民众生活的根本点，进入了自我扩张和自我循环的非良性发展轨道，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金融危机。

产业空心化是指一些国家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迅速地转移到国外，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发展服务业要注意避免产业空心化，这一提示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就一定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过程中，从供给侧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精细化发展，将其作为促进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在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为人民生活幸福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在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制造业绝不能空心化，这是一条底线。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衣食住行不能都靠进口解决。农业要保持一定比重，并要加快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当前要坚决控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现象，防止金融和房地产等容易被作为资产增值手段炒作的行业过度自我循环与膨胀，防止其毁坏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抓住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撰写的题为《抓住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的文章。文章围绕当前被广泛热议的“社会创业背景下的公益创投发展”这一重要话题展开分析与讨论。文章内容如下（删节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这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市场需求快速扩张，供给不论优劣都有市场需求，转变发展方式既缺乏压力也缺乏动力。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换挡，市场需求扩张放慢，需求结构深刻变化，必然要求加快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进而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并用好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提高农业供给效率。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供给结构上的一大短板。为此，应当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一个整体，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城市户籍制度等改革，畅通城乡沟通交流渠道，把城市的资本、技术、高素质劳动力

引入农村，促进农民工留守亲属进入城镇定居。这必将释放新的巨大发展能量，成为新阶段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改革投资体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各级政府应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开发公共产品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在政府主导下，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对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释放需求潜力、稳定经济增长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完善激励机制，加快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完善对企业和研发人员的创新激励机制，加快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带动产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由院长干春晖教授撰写，发表于《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论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论证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现状和面临的新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走向繁荣复兴，持续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当前经济增长率降至6%-7%，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面临新的问题 and 挑战，一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产业竞争力不足，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在全球贸易中遭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两头挤压；二是国内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土地财政、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严重掣肘中国经济发展；三是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种问题与挑战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说明,改革开放是已经被事实验证了的正确方向,“新常态”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同时要发挥大国综合优势,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服务业开放与我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研究——基于特定服务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服务业开放与我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研究——基于特定服务业的面板数据分析》由我院特聘研究员李眺撰写,发表于《产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论文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的服务业开放对我国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

论文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开放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特征对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的生产效率影响。研究表明,进入规制显著地抑制了上述三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并且非国有资本占整个行业的比重越大,行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越明显,但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行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此外,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结构对批发零售业及金融保险业的生产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服务业开放不能侧重于“对外资开放”,更为重要的是放松政府的各种规制,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与此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以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来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型和升级。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由我院特聘研究员吴一平撰写,

发表于《经济管理》(2016年第5期)。论文利用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忽视了政企关系的重要价值。论文利用2005年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以中央政府换届作为事件冲击,从企业所有制性质、高管任命方式及非生产性支出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面对中央政府换届所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企业投资会显著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论文发现,上述负面影响仅存在于政企关系相对较弱的企业之中,即非国有企业、总经理为非政府任命的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相对较少的企业。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构建良好和稳定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以减少其对市场的干预,对于促进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商务、资源获取与中国民营企业绩效》

《电子商务、资源获取与中国民营企业绩效》由我院特聘研究员吴一平、王健共同撰写,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论文利用大量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

论文利用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规模较小的企业从中获益更大。进一步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这种正面影响是因果性的。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通过帮助民营企业以更低价格购买投入品以及获得更大规模银行贷款等渠道提升企业绩效。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对于缓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境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院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产经文库》系列丛书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产经文库》系列丛书，第一批丛书包括《居民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王宇博士著）、《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结构、制度与战略》（研究团队论文集）、《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郑若谷博士著）、《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王健博士著）、《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李津津博士著）、《电子商务产业链治理及升级路径》（王法涛博士后著）共6部。

产经文库系列《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结构、制度与战略》

近年来，研究院研究团队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主持完成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and 升级》和《“十一五”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的自主创新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和《“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研究项目，同时也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经过院长干春晖教授的筛选与修改，汇编出版了研究团队的论文成果，其中《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一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其他数十篇工作论文也陆续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内容一经发布即得到了产业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肯定，如《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结论被广泛引用，还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研究院团队的 16 篇优秀研究文章。本书的研究认为，在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高速增长，经济年均增速达 9.7%，增长速度不仅快于主要发达国家，即使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十分突出。但近年来，中国经济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渐结束，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增速在 6%-7% 之间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虽然这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与此前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大部分的中国制造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从事低附加值、低技术的加工组装工作。而现在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如服装、玩具出口的比例则有所下降。因此在贸易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业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占比迅速下降，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低端的加工工厂角色不可能长久，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其次，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影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主要是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土地和物流等要素的成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导致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尤其是缺乏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其价格变动对中国制造的成本影

响非常大；从土地价格角度看，商业服务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连年快速上涨，极大提高了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如果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新常态”下中国仍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必须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有可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适应和调整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意识到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和可能超越美国的长期趋势，开始倾向于使用遏制中国的战略，除了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中国采用更多遏制措施之外，在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也有开始从合作走向竞争与遏制的取向。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与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之外，还在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与差异，因此同样需要探索如何建设性管控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实现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和平崛起。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挑战，需要根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独特优势制定新的战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首先，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基本战略。未来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道路只要通过分析我们过去 30 多年的成功之路就可以得到，那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允许劳动力在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加入 WTO 、

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和加强等改革开放的措施，以改革开放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成果显著。

其次，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实现产业升级。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采用了类似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使企业走向世界。与小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还可利用自身大市场的独特优势，通过满足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驱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国要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实现赶超，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

第三、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哪些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首先必须培育有效市场，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破除各种要素壁垒和产业限制，培育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培养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次是针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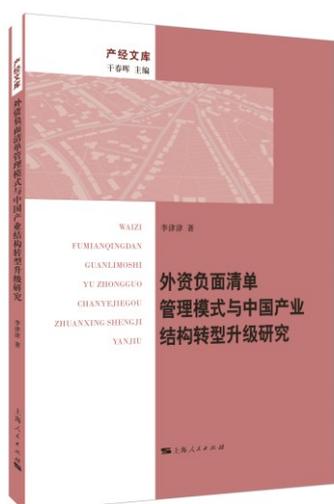
第四、积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国际贸易已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中国企业现在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做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尤其是在原有的生产加工基地失去成本优势时，将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后，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而不是被锁定于某一个低端环节。

产经文库系列《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津津博士所著《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一书，围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的外资负面清单这一制

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分析其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本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然而，伴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



的逐渐衰减、新竞争优势的“断档”，以及前一轮改革红利与制度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高速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变，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前期政策也进入了消化期，在这“四期叠加”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形势下，如何缓解、突破经济转型升级硬约束的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

创新释放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与制度红利，成为了当前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了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首要举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从内容上看，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为“1+3+1”模式，即“投资管理创新”+“金融创新、航运创新、贸易创新”+“监管创新”。其中投资管理制度创新成为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擎，而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引擎的核心所在。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该模式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规定不可以做的，规定之外的即为对外资开放的领域。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一改过去正面清单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所带来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职能从注重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定，以及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机理和路径是十分关键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包含负面清单在内的一套管理方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对外开放，即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取消不合理的外资产业进入限制，特别是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断用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而如何更好的制定外资负面清单产业投资目录，转变政府职能，对于不断完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本书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对负面清单国际经验的比较，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外资负面清单产业开放选择的理论基础，并据此测算我国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清单文本制定的未来方向。第二，从负面清单包含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化的角度，探讨了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进而指出如何更好的完善现有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如何采取配套的措施从而更好的发挥负面清单的作用。第三，全面梳理我国现有负面清单的产业分布、结构和要素，以及我国与不同国家签订负面清单的注意事项。

产经文库系列《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健博士所著《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一书，围绕制度要素对我国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动态的视角分析我国产业比较优势。

本书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

国际分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从动态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将会发生怎样的转换？哪些产业可以接棒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简单来说，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就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正是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不断验证的。但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主要讨论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要素，缺乏对制度这一特定要素的分析。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意味着，制度作为一种特定的要素，完全可以纳入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框架，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



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各种制度扭曲仍然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必须全面和深化改革。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制度的改革将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背景。

因此，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按照要素禀赋论的分析框架，对制度依赖度比较高的行业也将逐步地建立起比较优势。从动态的视角上，研究制度与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趋势，从产业层面上明晰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一分析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也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在“G20 中国峰会：全球治理的比较视角”发表主题演讲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G20 中国峰会：全球治理的比较视角”上，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新立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和体制方面的差异。

郑新立表示，就科技创新能力而言，美国去年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是中国的 1.9 倍，但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的增速远高于美国，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在快速逼近美国。

科技创新制度方面，郑新立认为，中国应该虚心向美国学习五项内容：建设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提出具有带动意义的重大工程，引领科技进步；建设开放型的国家，吸引全球人才；建设一套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打破军民壁垒，实行军民结合的体制。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出席“中国经济下行对上海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应邀出席了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市社联召开的“中国经济下行对上海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专题研讨会。本次会议有来自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

余典范认为经济下行关键就看两个指标：一是就业，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要守住这两条底线，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目前市场也面临投资下滑厉害、利润同比基本负增长（尤其制造业领域）、以及一些如：资产性获利能力差异下社保系统脆弱、社会阶层固化、缺乏流动性等可能的问题。对此，余典范认为，以时间换空间，但主动淘汰的方式成本太高（拆迁安置、维稳就业等综合社会成本），因此逐渐的更多采用市场化手段运作（即鼓励先进创新、鼓励兼并，但也不主动关闭落后，而是用高成本让落后企业自然退出）。

我院院长助理余典范出席“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研判会”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研判会”由上海市教卫委、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上海市教卫党办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杰、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余典范等专家出席本次会议并作发言。

余典范提出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协同助力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路，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对接需求，需求管理同样要配合供给侧改革，从经济的发展上来看，供给侧改革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升级做出反应。供给侧改革需要提高供给要素的配置效率。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本、土地、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上，要实现上述要素的升级，政府应重点在国企改革和简政放权上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不能仅仅停留着国家层面，更大空间应该在地方。

我院联络人参加“第十期智库工作坊”并作交流发言

2016年3月25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十期智库工作坊”顺利举行，会议由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主办，出席会议人员为上海18家高校智库负责人和联络人，我院联络人王鑫洁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本次会议全程围绕“智库运营团队的经验交流与分享”的主题，分为专题报告和交流发言两个环节。在报告环节，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昊作题为“关于政策建议报告若干问题”的报告，复旦发展研究院咨政事务办公室项目主管沈郊作题为“智库报送与反馈机制”的报告，中心项目主管朱红蕊作题为“从‘访问学者项目’谈智库品牌运营”的报告，分享了智库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介绍了中心前期“访问学者”的案例，指出“访问学者”项目有助于智库间交流、也有助于智库专家咨政能力获得提升；中心项目主管夏梦作题为“从‘微信公众号’谈智库品牌运营”的报告，介绍了中心微信公众号自创立以来的运营方法，同时也要求各家智库单位在筹备或运行微信公众号期间，加强与中心公众号的信息共享，以期提高“上海高校智库”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在交流环节，各家智库联系人根据自身智库特点以及智库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挑战进行交流分享，各家智库在2015年决策咨询成果丰硕，但在体制机制方面仍需学校和教委进一步的联系与帮助。最后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根据发言内容总结，他指出上海高校智库培育到第三年，各家智库在决策咨询服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各有建树，应该加强智库间的联系和合作，建立长期有效的交流机制，互相学习成功经验、互相沟通创新办法，为更好建立“上海高校智库”品牌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研究院协办“2016年亚洲经济展望”专题报告

2016年4月1日下午，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教授来我校做题为《2016年亚洲经济展望》的专题报告，200余位师生前来聆听讲座。该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主办，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协办，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主持报告会。

报告中，魏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亚洲发展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报告通过两部分进行了分享：“2016亚洲经济整体预期篇”和“主题篇：亚洲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

在“2016亚洲经济整体预期篇”中，魏教授指出亚洲发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16-2017亚洲发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继续放缓，会从2015年的5.9%回落至5.7%。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劳工资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2016年预期增长会在6.5%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并不高。魏教授也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降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将对整个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在“主题篇：亚洲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中，魏教授表示亚洲经济能否避免“昙花一现”将取决于未来增长的潜力。他给出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公式，即“增长的潜力=劳动力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从2000年以来，亚洲经济增长潜力指数不断下降，除人口红利不断消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朝着不利于进一步增长的方向发展，所以必须通过多种改革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使亚洲经济保持活力。这些改革包括通过供给侧政策调整从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少资源错配，激发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当前，亚洲经济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层面仍有相当的调整空间。

报告结束后，在座师生热情不减，就中国经济增长小幅下降、供给侧改革的

优势性、中国汇率、中国潜在增长率等问题积极发问，魏教授也一一对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师生们一致表示魏教授精彩的报告令人意犹未尽，希望以后能多有机会参与这样高水准的讲座。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地址：上海市国定路777号
邮编：200433
电话：021-65908821
传真：021-65908996
电邮：cidi@mail.shufe.edu.cn
网站：cidi.shufe.edu.cn
微信公众平台：上财产经智库



网站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